

邵传烈

求索集

浙江人民出版社

求 索 集

邵 传 烈

浙江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严麟书

封面设计 范一辛

求 索 集

邵 传 烈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96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6.75 字数124,000 印数0,801—9,000

1982年3月第1版 1982年3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103·262 定 价: 0.43 元

目 录

读周总理的一封信所想到的	1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6
欢迎乔厂长上任	10
刘厂长的“军令状”	16
再谈刘厂长的识	19
三谈刘厂长的专	22
请以“三问三不知”为戒	25
关于杨度	29
喜读“来函照登”	33
摆脱虚名的困扰	36
推荐克里克博士的谢绝书	39
思想解放的先驱者	42
“不要把自己看作一粒珍珠”	48
从有限中求无限	54

略论“雷锋型”	58
我在大舞台上……	62
理想的力量	68
现在与未来	72
“只有懒汉是没有天才的”	75
“良心”问题	80
流言之害	82
磨刀石	84
青春的光辉	86
人生就要进击	90
到哪里寻找“基度山”？	94
珍惜您的“最佳年龄”！	100
揭榜前夕话心情	105
——致考生	
说“破格”	108
后悔能及	111
论“虚无”	113
你赞成“为朋友两肋插刀”吗？	117
到哪里去寻找爱情？	120
也谈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125
漫话生活情趣	128
审美三题	132

维纳斯的美及其他	139
由“盲公镜”引出的议论	143
一张桌子四条腿	146
——关于美育的对话之一	
用艺术精神雕塑美好灵魂	150
——关于美育的对话之二	
蒙以养正	155
——关于美育的对话之三	
社会美育问题	159
——关于美育的对话之四	
“只要奋斗，就有出路”	163
古代空话	169
向前看	172
为国家分忧解愁	176
不应该失掉自信心	180
不悔当初	183
故土的魅力	186
灯塔看守人何以误事？	188
“十八盘”，何足惧！	191
赤子之心	194
八十年代的一种时代精神	197
——向中国女排学习之一	
为祖国的荣誉去顽强搏击	200
——向中国女排学习之二	

要有一手“铁榔头”的本事	202
——向中国女排学习之三	
团结协作的集体主义精神	204
——向中国女排学习之四	
后记	206

读周总理的一封信所想到的

读周总理于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九日写给淮安县委的一封信，颇发人深省。

当时，淮安县人委准备修理周总理的旧居，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很不安，认为“万万不可”，就亲自给淮安县委写了一封长达五页的信，随同汇去五十元钱，作为修理房屋的费用，并要求将全部房院交公家处理。周总理在信中写道：“在公家接管房院后，我提出两个请求：一是万不要拿这所房屋作为纪念，引人参观。如果有人问及，可说我来信否认这是我的出生房屋，而且我反对引人参观。实际上，从我婶母当年来京谈话中得知，我幼时同我寡母居住的房屋早已塌为平地了，故别人传说，都不可靠。二是如公家无别种需要，最好不使这所房屋的住户迁移。后一个请求，请你们酌办，前一个请求，无论如何，要求你们答应，否则，我将不断地写信请求，直到你们答应为止。”

此后，在一九六〇年，周总理接见赴京的淮安县委负责人，在谈到他的故居时，又严肃地说：“我的房子不能

和毛主席的旧居比，请参观的人到韶山去。县里要把我的房子利用起来，不要空着。”

这是一种多么感人的无产阶级美德！身为国家总理，第一坚决不愿意宣传他自己，不愿意离开群众、离开党中央突出地宣传他个人；第二坚决不用公家的钱来修理自己的房屋，而且要自己付钱修好了房屋，上交给国家。这里，用“不搞特权”、“廉洁奉公”等赞语，已难以确切地表述周总理的高贵品质。更令人感动的是，周总理在这封信中，一连用了三个“请求”，言词恳切，平等待人。信中没有一点上级对下级发号施令的气息，没有一句应该怎样、必须那样的指示口吻，从信的内容到语言，处处体现了周总理把自己放在和群众完全平等的地位、尊重下级和被领导者的共产主义精神。时时事事处处注意自己不搞特殊，正是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品格高尚之所在。

我们有些同志却不是这样。他们把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权力，看作是为个人谋私利的本钱。有的人居高临下，动辄训人、骂人；有的人慷国家之慨，巧立名目，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有的人利用职权，互相酬答，拿人民的财产做买卖，真可谓“居官有同贸易，出仕专为身谋”；还有的人身居要津，不仅自己“醉醇醴，饫肥鲜”，连全家老小也洪福齐天。艰苦奋斗、献身四化之类的话，口头上有时也讲几句，但那是讲给老百姓听的，他自己呢，对不起，“官话”离开了办公室，对“私事”并不管用。

利用职权搞特权，这是封建社会的一种遗毒。在封建社会里，做了官，便成了“人上人”，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从穿戴、第宅到出行、进项，都得与众不同，这就是所谓“特殊化”。就拿清朝官员顶戴的颜色来说，各级官员也是不一样的。一二品是红色的，三四品是蓝色的，五六品是白色的，七品以下为金色。在同色之中，各品又有区别，一二品有纯红和杂红之别，三四品有亮蓝和暗蓝之别。顶戴颜色的区别，标志着封建官吏特权的大小。《儒林外史》里的那个范进，在中举之前是个穷秀才，穷到连打发报子的喜钱也拿不出；一旦中举后，立即改换门庭，成了“范老爷”，做过一任知县的张老爷赶紧来拉关系，声称“我和你是亲切的世弟兄”，送给范进一所三进三间的房屋和五十两贺仪。此后，范老爷的日子就好过了，“有许多人来奉承他：有送田产的，有送店房的，还有那些破落户，两口子来投身为仆图荫庇的。不到两三个月，范进家奴仆、丫环都有了，钱、米是不消说了。”中了一个举人，便有诸多好处，至于弄到一官半职，或者放个外任官，巧取豪夺，敲诈勒索，“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贪赃枉法的情景，更是可想而知了。

搞特殊化同一个共产党员的称号是不相符的，也是违反党章规定的。党章规定，共产党员应该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为个人或少数人谋取私利”。党章总纲还指出：防止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谋取任何特权，同资产阶级思想和作风作坚决的斗争。重温一下党

章的规定，对照一下周总理给淮安县委的一封信，那些利用职权搞特权的人所作所为，离开党章的规定不是相距太远了么？当自己把手伸得很长的時候，那会给党的威信带来多大的损害？请听一听群众的批评：国家还没有实现现代化，你们个人的生活却先“现代化”了，群众还有许多困难没有解决，你们那些不成其为困难的问题却一一解决了，这是革命干部应有的品德和作风吗？如果还有点觉悟的话，听到了群众的这些批评，在反省自责的同时，不应该及早改正这种错误吗？

值得注意的更在于：有些同志至今还不以搞特殊化为耻，反以此为荣。我们更有必要大声疾呼：这是一种封建思想意识在作祟。党的政策不允许办的事，你来了个“飞过海”、“金蝉脱壳”，个人占到了便宜，社会主义利益受到了损害，这种“路道粗”又有什么光彩呢？开到了后门，自以为得计，群众对你当面侧目而视，背后大骂其山门，这种“捞”来之食吃到肚皮里，又有什么味道呢？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特殊化这股歪风不刹住，这种封建思想意识和剥削阶级作风不去掉，那么，要加快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难矣哉！

按理说，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封建社会的特权观念，已经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土壤。但是，由于中国的封建制度绵延了二千多年，封建道德观念曾经通过各种途径，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去。升官发财、夫荣妻贵、“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之类的腐朽思想，至今还有它的市

场。特别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刮起了一股特权风，穷奢极欲，挥霍无度，毒害了不少同志的思想。彻底治愈这种“内伤”，在道德观念上来一个拨乱反正，还要花费相当大的气力。

斯大林同志曾经说过，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共产党人的特殊之处，正在于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社会，但不向社会索取任何特权。周总理曾经对一些革命干部子弟说过：“你们的父辈为人民流过血，立过功。但他们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既没有什么遗产留给你们享用，更不会留给你们任何特权。”“如果说要特殊，你们就只能在多做工作这一点上特殊。”说得多好！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人，只应该在埋头苦干、多做工作，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上，显现出他们与众不同的特殊品质来。周总理为我们树立了这样一个光辉的典范。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在学习《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提出了这样的口号：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两句口号，提得很好，值得提倡。

从我做起，就要求广大党员有高度的自觉性，严格要求自己。我们每讲一句话，每做一件事，都要想一想，自己的一言一行，是否符合《准则》的要求，是不是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改变党风这件大事，是要广大党员一起来做的。因为党风不是抽象的、不可捉摸的东西，而是体现在每一个党员身上的。如果我们大家都能“行”字当头，逐条做到，我也做一点，你也做一点，人人从一点一滴做起，形成一种事事按《准则》办事的好风气，我们就能逐渐把党风整顿好。反之，如果光打雷，不下雨，空喊一阵，然后把它束之高阁，或者光要求别人做到，自己却仍然我行我素，于事还是无补的。

从现在做起，就是要有一种自我改造的紧迫感。要看到四化建设迫切要求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人民群众对党和党员怀着殷切的期望；要看到党中央已下了决心要把党

风整顿好。怎样做一个处于执政地位而又肩负四化建设重任的党的党员？这个问题，已经尖锐地提到每一个党员的面前。我们要振奋革命精神，珍惜分分秒秒，抓紧改造自己，适应新时期的需要。时间决不是虚无缥缈的东西，它在我们手中是战斗的利器。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美好的未来离不开现在的努力，着眼于现在就要从我做起。被耽误了的昨天，只有通过现在的努力才能夺回来。往事已矣，来者可追。如果从现在开始努力，为时一点也不晚。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哪里做起呢？具体地说，就要认真学习《准则》，就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工作和作风一条一条地对照，一条一条地找差距，看到存在的问题，明确应该达到的要求。比方说，对三中全会以来党中央制订的路线、方针、政策，自己是不是认真学习和领会了，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那一套框框有没有破除，是不是在政治上同党中央完全保持一致；又比如，在贯彻民主集中制方面，是不是还有“一言堂”、“一边倒”的现象，同志之间是不是齐心协力，派性有没有根除，组织纪律又执行得怎么样？再比方说，自己有没有昂扬的斗志，艰苦奋斗的精神，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好作风是不是继续发扬了？如此等等。联系实际学习《准则》，就要把自己摆进去，对照《准则》的规定，认真检查自己的工作和作风，发扬成绩，克服缺点。符合《准则》规定的就坚持下去，不符合的就坚决改正。要切切实实地学，切切实实地做。

“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还要求我们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来整顿我们的思想作风，主要的就是坚持党的正确路线，加强党的团结和统一，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和组织纪律性。今天我们不搞整风运动，但整风精神则是永远要发扬的。现在，在对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上，有一种倾向是不敢批评、不愿批评。明明看到了一些不正之风，看到了某些同志身上的缺点，却出于这样那样的顾虑，眼睛一闭，少说为佳，明哲保身，但求不得罪人，甚至听到了政治上与党中央路线唱反调的言论，也不表态、不批评。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实行批评与自我批评正是搞好党内政治生活和端正党风的基本方法。每一个共产党员，应当按照《准则》的要求，自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旗帜鲜明地对派性、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特殊化等错误倾向，开展积极的批评。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如果不坚持真理，对错误倾向和坏人坏事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那就放弃了共产党员的责任。这本身就违背《准则》的规定。当然，在党员之间开展互相批评，包括党员对领导干部的批评，都应当注意政治，根据事实，具体分析，以理服人，并采用和风细雨、循循善诱的方式，切不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动不动就打棍子、戴帽子、揪辫子。

对于自我批评，也应当有一种正确的态度。共产党员是不害怕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或者一听到批评就以为是“挨整”，甚至怀疑别人

是否“别有用心”。敢于正视和摆出自己的缺点、错误，勇于克服自己的缺点、错误，那是有无产阶级党性的表现。周总理曾经说过：“有错误要逢人就讲，既可取得同志的监督帮助，又可给同志以借鉴。”周总理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为了把我们的党风整顿好，我们决不能以公开说出自己的缺点、错误为耻。自己思想作风上有了毛病，别人提出了批评，听后脸红一下，出一身热汗，却把思想上的毛病治好了，这不是很好吗？

实现四化，关键是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提高党的战斗力。我们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深入的党风党纪教育，就要强调提高每个共产党员的自觉性，强调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欢迎乔厂长上任

蒋子龙同志写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值得一看。特别是担负领导职务的同志，更有必要多读几遍。

小说一开头就奇峰突起。在机电工业局党委的扩大会上，一个急迫的问题摆在面前：“四人帮”倒台已两年半了，重型电机厂已两年零六个月没有完成生产任务。派谁去收拾这个烂摊子？电器公司经理乔光朴挺身而出，接过重任，还甘愿立下“军令状”：“我去后如果电机厂仍不能完成国家计划，我请求撤销我党内外一切职务。到干校和石敢去养鸡喂鸭。”

毛遂自荐，古已有之。但是，乔光朴自告奋勇要求到重型电机厂去，似乎有点“自讨苦吃”。因为原先这个“公司经理”的职位，在有些人眼里，实在是一个难得的“美缺”：上有局长，下有厂长，能进能退，能攻能守，形势稳定可以进到局一级，出了问题还可以上推下卸。现在，他放着熟路不走，偏要去念基层这本最不好念的经。这岂不是“自讨苦吃”？关于这个问题，还是听听他自己的意见：“象电机厂这样的企业如果老是一副烂摊子，国